

城乡性别作用模式的差异 ——以德州话(ei)变项为例

刘昊坤¹, 张璟玮²

(1. 澳门科技大学 国际学院 澳门 999078;
2. 澳门大学 人文学院 澳门 999078)

提 要 目前我国城市化进入“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为了探索我国城市化新阶段城乡复杂的语言变异情况,本研究利用“快速匿名调查法”,以“德州”一词为目标词,对德州市区、县城、乡村(ei)变项的共时分布情况展开调查。方差分析显示:年龄,空间,空间和年龄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空间和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具有显著的制约效应。性别因素在德州城乡之间具有不同的作用模式,在市区和县城,性别差异并不显著;在乡村,女性相比男性会使用更多的本土变式,这与西方性别标准模型相反。前者是由我国国情下两性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后者则与德州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男人进城务工,女人留守看家”的家庭分工模式相关。

关键词 变异社会语言学;性别差异;快速匿名调查;德州话;城乡对比

Differences of Gender Roles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s: A Case Study on the Variable (ei) in the Dezhou Dialect

Liu Haokun, Zhang Jingwei

Abstract: China's urbanization has come to a new stag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o explore the sophisticated situations of language variations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s in this stage, we use the "rapid and anonymous observ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variable (ei) in the urban, county, and rural areas of Dezhou via the lexical item "Dezhou"(德州). ANOVA shows that age, spa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nder and spac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ge and space are significant. There are different gender patterns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In urban area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However, in rural areas, women use more native variants,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standard gender pattern model. The former is due to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which has a relatively equal social statu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and the latter arises from the emergence of a family division of "men work in the city, women stay at home" under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作者简介:刘昊坤,男,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电子邮箱:haokunliu@fox-mail.com。张璟玮(通讯作者),女,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变异与变化、社会语言学。电子邮箱:jwzhang@um.edu.mo。

Key words: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gender difference; rapid and anonymous observation; the Dezhou dialect; urban-rural comparison

一、引言

性别作为最经典的社会变项之一,社会语言学家已有许多讨论。最早将性别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社会语言学独立变项来研究的社会语言学家是拉波夫(William Labov)。他早期进行的马萨葡萄园岛研究(Labov 1963)和纽约市调查(Labov 1966)将性别作为自变项并发现女性相比于男性倾向于使用更多的标准变式,这一发现在之后的变异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验证,Fasold 称其为“社会语言学的性别模型”(徐大明 2006)。

汉语中性别差异比较经典的案例有“女国音”和“女书”。此外,近年来汉语变异研究中很多都关注了性别作用模式,然而结果与西方的“社会语言学的性别模型”不尽相同。比如曹晓燕(2012)发现无锡市区男性相比女性更多地向标准语趋近,不再区分尖团音,她将原因归结为尖音可以迎合女性柔弱爱美的心理。孙德平(2013b)对潜江市江汉油田“潜”字声调进行调查时也发现,男性更多使用趋近普通话的阳平调,女性则更多使用具有油田特色的上声调,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油田口音比普通话口音在当地更有威信,而油田女性相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这种权威变式。李荣刚(2011)对连岛村(f)变项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男性使用更多标准变式[f],而女性使用更多带有地方色彩的变式[x]的状况,他认为前者是高威信的权威变式,代表着对传统渔业生产方式的背离和放弃,并且将这种性别作用模式归因于当地“男人出海,女人拾海”的传统生产模式。除此之外,也有大量汉语研究发现性别制约作用不显著。如 Xu(2015)于 1987 年和 2003 年两次对包头市昆都仑工业区鼻韵尾变异情况进行考察,发现性别制约作用不存在于鼻韵尾脱落变项和儿化变项之中,他将原因归结为该移民型工业社区尚未完全成熟。李荣刚(2011)在对连岛村(n)变项进行调查时同样发现男女的变式选择情况趋于一致,而并不是像(f)变项那样具有较大的性别差异,他将这种现象解释为(n)变项尚处于变化的早期阶段。丁存越(2015)在调查南京市区儿化音变异时也发现性别制约作用不显著的现象,她将原因归结为当代中国社会女性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

经典的“社会语言学的性别模型”是在完成了城市化进程的英美等国家的城市言语社区中归纳出的,而不少汉语变异研究在农村或者县城开展,即便在我国城市中也有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因此我们推断汉语变异研究有别于“社会语言学的性别模型”的结果很可能与我国的城乡结构有关。

为了全面了解汉语变异研究中的性别作用模式,我们在中国知网中检索有关性别作用模式的变异文章,并从城乡差异的角度进行归类分析。具体操作步骤为:以“变异”主题检索“中国语言文字”学科下的所有中文学术期刊,然后将其中讨论性别作用模式的汉语变异研究筛选出来。我们重点考察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及其扩展版来源期刊中刊登的 34 篇文章:丁存越(2015),董洪杰(2017),郭骏(2011),李庐静(2013),李琼(2015),李荣刚(2011),李伟、陈章太(2010),李永斌(2014),刘英(2009),刘英、徐大明(2012),冉启斌(2017),单韵鸣(2012),单韵鸣(2013a),单韵鸣(2013b),单韵鸣(2014),史慧媛(2012),史濛

辉(2016),孙德平(2009),孙德平(2013a),唐健雄、高彩英(2010),唐志强(2023),王佳琳(2017),王佳琳、侯煜冠(2012),王立(2004),王玲(2009),王玲(2011),王玲(2012),王玲(2014),王玲、刘艳秋(2014),王玲、徐大明(2009),王雪(2020),徐大明(2008),周晨萌(2005),朱学佳(2014)。

由于部分文章中涉及多个语言变项以及多个社会因素分组(年龄、职业、籍贯等)下的性别变项,且不同情况下的性别作用模式并不相同,因此我们根据每篇文章的具体情况将34篇文章中的性别作用模式分为119组,我们根据调查地点将其按市区、县城、乡村进行三分,整理如表1所示。

表1 已有研究中性别作用模式统计(单位:组)

	符合标准模型 女>男	不符合标准模型		总计
		女<男	女≈男	
市区	39	7	28	74
县城	12	8	13	33
乡村	3	2	4	9
市区和县城	1	0	1	2
市区和乡村	0	1	0	1
总计	55	18	46	119

注:1. 关于市区、县城、乡村的定义,本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中对四级行政区的划分,将市区定义为包括一级省级行政区和二级地级行政区在内的地区,县城定义为包括三级县级行政区在内的地区,乡村定义为包括四级乡级行政区在内的地区。2. “女>男”指女性相比男性更多使用标准变式的情况,“<”和“≈”同理。3. 本文将标准变式认定为受普通话影响而形成的变式。

从表1可以发现,第一,已有研究中,城乡的性别作用模式确实不同。市区中符合性别标准模型的结果为主流,占53%,但不符合标准模型的研究也不少,占47%;县城和乡村中不符合标准模型的研究为主流(县城中占64%,乡村中占67%)。第二,已有研究对市区的调查最多,而且对市区的调查往往集中在大城市(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对小城市的调查较少;对县城和乡村的调查也较少(县城占28%,乡村占8%)。第三,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单一地点开展,而对性别作用模式进行多地城乡对比的研究较少。因此,要想准确地了解汉语社会语言学的性别模式,就必须考虑城乡差异。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到了“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城乡融合建设初见成效。在此形势下,城乡居民的语言进一步接触和融合,因此带来了复杂的城乡语言变异情况。分析这些变异现象的性别分布,能够深化我们对汉语社会语言学性别模式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的理解。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山东德州话的(ei)变项。德州话中部分带“ei”的字,如“德州”的“德”字,其韵母可以读作[ə]和[ei]两个变式,即德州一词既可以趋近普通话的读音,读作[tə²¹³ tʂəu²¹³] ,也可以读作本地色彩更为浓重且与普通话差异较大的[tei²¹³ tʂou²¹³]。本文对德州市区、县城、乡村(ei)变项的共时分布状况展开调查,将性别列为社会因素进行对比研究,以此探索其中语言变异的复杂情况。

从德州方言音系的角度讲,(ei)变项中[ei]变式来自曾摄开口一等入声德韵字(钱曾怡2001)。已有文献记载,该来源的字在德州话中存在[ei 白/ə 文]两读现象(郭春霞2008),而文白异读是来源不同、进入当地时间不同的两个(或几个)音韵层次在共时音系中的叠置,各音韵层次间有成系统的同源对应,但它们不是直接的继承发展关系,而是反映某一历史层面上土语音系与权威方言音系的接触与竞争(王洪君2006)。再加上其文读音和白读音在口语域和书面域中均为流通,因此我们将[ei]变式认定为是来自德州本地音系的本土变式,将[ə]变式认定为是受到普通话影响的带有地方特色的折合变式。

《方言调查字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81:67)中曾摄开口一等入声德韵字有15个,分别是“德、得、北、墨、默、忒、特、肋、勒、则、贼、塞、刻、克、黑”。由于德州话受到普通话影响较大,因此为了确定具体哪些字仍存在两种变式共存的情况,我们采用方言调查的方法采访了18位本地人,每一空间、每一年龄、每一性别所调查的人数为1,结果显示尚存在两种变式的字有“德、得、墨、肋、则、勒、塞、刻、克”9个,我们从中选择“德州”一词作为本次调查的目标词。

二、调查设计与数据收集

(一)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Labov在调查纽约(r)变项分布时使用的快速匿名调查法,以调查者假扮路人在街上随机向路人询问的形式进行调查。调查员有两人,均为德州市区人,一人询问一人记录,询问时使用德州话,并避免使用具有城乡差异的词汇,情景如下:

问:你/您好,大叔/大伯/大哥/大婶……,我想问一下,武城属于哪个市的啊?

回答情况:……属于德州/德州市/德州地区^①……

(若回答不顺利,则继续追问)

结束对话后,记录此次调查是否成功,若失败则记录原因,并记下被询问人的年龄、性别、空间位置以及被询问人的变式选择情况,如有改口,以首次为准^②。以此为一个调查样本。

(二) 调查地点

调查地点选在德州市德城区(市区)、武城县县城(县城)以及武城县下辖的李家户乡镇(乡村)。武城县在德州德城区西南方向34千米处,李家户乡在武城县县城的西南方向8.5千米处。

德州市区所调查的区域是由三八西路、解放中大道、东风中路以及中心广场所围成的德州市的中心城区,调查面积约1.5平方千米。县城所调查的区域是由北方街、兴武路、振华街

^① 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德州地区,改设地级德州市,将原县级德州市改为德城区,新建地级德州市行政区划与原德州地区行政区划相同。

^② 第一次发音是下意识的,比较自然,符合“表现为准”的原则。后续的发音被询问人也许会有意识地“纠正”自己的读音。

和少年路所围成的中心城区,面积也在1.5平方千米左右,含县人民医院及县政府等中心建筑。乡村所调查的区域为武城县下属的李家户乡镇及其村落,面积约15平方千米。由于乡村人口稀疏,且以村为单位呈点状分布,所以我们在这一区域实际上只调查仁里庄村、梁庄村、王家户村、英庄村、刘王庄村、刘官屯村及李家户乡镇镇上。中间大片农田人烟稀少,不在调查范围内。

(三) 调查人数

本次调查总人数为540人,采用分层定额抽样和偶遇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对路人进行调查。分层定额抽样的变项包括空间、年龄和性别三个。空间分为市区、县城和乡村三类。年龄分为老年、中年和青年三类。性别分为男性和女性两类。同一空间、同一年龄、同一性别的调查人数是30。年龄段判别的依据是头发颜色和皮肤状态。

三、调查结果及数据处理

本次调查从2020年3月底开始,至4月底结束。最终得到了566个样本,其中包含无效样本26个,样本无效的原因有三个:(1)听力障碍(9个);(2)被询问人不知道问题答案或者回答错误(11个);(3)被询问人口音并非本地人(6个)。

图1为本次调查市县乡三地发音人选择折合变式[ə]的比例。可以看到,选择折合变式比例最低的是乡村老年女性,只有37%的人使用[ə],即63%的人使用本土变式[ei];选择折合变式比例最高的占比达到百分之百,包括市县乡三地所有青年人以及市区中年人,这些人只使用折合变式[ə],完全不使用本土变式[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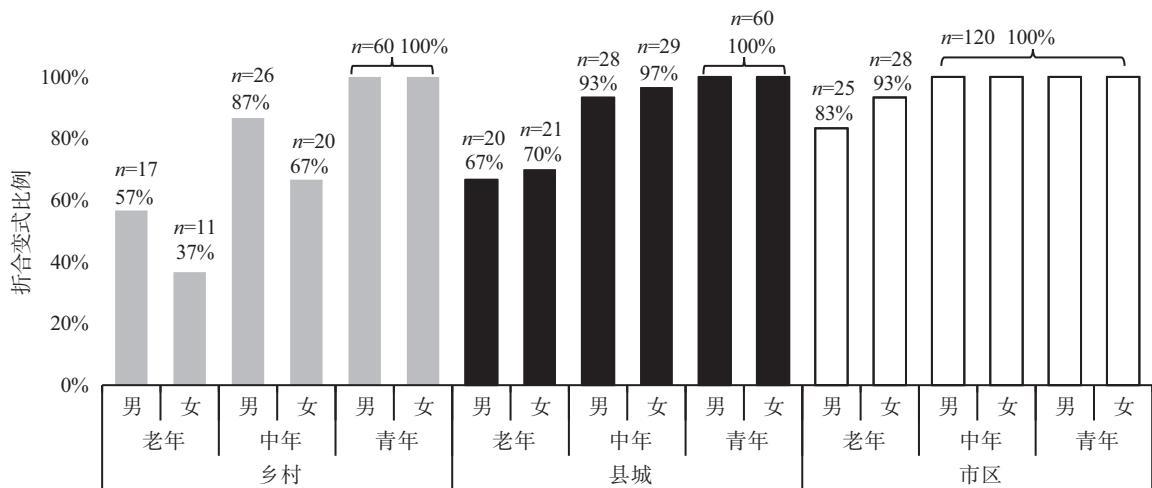


图1 德州市县乡三地折合变式[ə]的分布情况

为了探索各社会变项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否对于语言变项的选用具有显著制约作用,我们选择使用方差分析在SPSS 23.0中进行统计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性别因素自身并不对语言变项的选择具有显著制约作用,但性别和空间的交互作用却是显著的。此外,年龄因

素、空间因素以及空间和年龄的交互作用因素对语言变项的选择同样具有显著性制约作用。

表 2 语言变项与三个社会因素及其间交互作用的方差分析结果

因素	自由度	F 值	p 值
性别	1	1.023	0.312
年龄	2	55.683	0.000 ***
空间	2	24.240	0.000 ***
年龄/性别	2	0.397	0.673
空间/年龄	4	7.673	0.000 ***
空间/性别	2	4.405	0.013
年龄/空间/性别	4	1.242	0.292

注：显著性编码：*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我们接下来对影响变式选择的四个显著性因素进行逐一分析。

(一) 空间因素

从乡村到县城再到市区，折合变式的使用比例逐渐增加，分别为 74%、88% 和 96%。地区之间折合变式使用比例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显著差异。另外，城乡间折合变式的使用比例均大于 70%，说明整个德州市都偏向于使用折合变式 [ə]，体现了普通话对方言的深入影响。

(二) 年龄因素

老年人使用折合变式的比例仅为 68%，中年人是 91%，青年人是 100%。这说明越年轻，使用折合变式 [ə] 的人越多，值得注意的是青年人已经不再使用本土变式 [ei]。

(三) 空间和年龄的交互作用

从图 2 可以观察空间和年龄的交互作用。从乡村到县城再到市区，老年人使用折合变式的增幅最大，中年人也愈发倾向于使用折合变式，青年人不论城乡均不再使用本土变式。乡村老中青三代使用折合变式的比例差异最大，县城次之，市区差别最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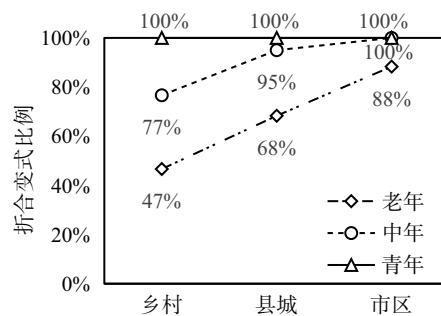


图 2 空间和年龄交互作用下的折合变式分布情况

(四) 空间和性别的交互作用

从图3可以观察空间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从乡村到县城再到市区,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折合变式使用比例均越来越高。同时,两条折线存在交点,且交点在乡村和县城之间,这意味着乡村同县城以及市区的性别作用模式是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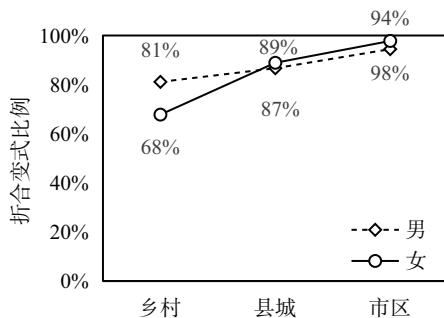


图3 空间和性别交互作用下的折合变式分布情况

我们按性别对数据分组,分别对乡村、县城、市区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在乡村,性别因素具有显著性制约作用 $[t(180)=2.063, p=0.041]$,也就是说乡村男性使用折合变式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而在县城或市区,性别因素则不显著[县城: $t(180)=-0.453, p=0.651$;市区: $t(180)=-1.154, p=0.250$],这说明县城和市区男女折合变式使用比例在统计学意义上都没有显著差异。

德州乡村出现了与性别标准模型相反的情况,而市区和县城性别差异并不显著。这种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乡性别作用模式的差异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本文将详细讨论。

四、关于城乡性别作用模式差异的讨论

(一) 市区和县城性别作用模式的社会动因分析

在德州市区和县城中,性别并不是显著性制约因素。从表1中我们已经看到,已有研究中性别差异不显著在国内是一种普遍现象(市区中占38%,县城中占39%,乡村中占44%,总体中占39%)。丁存越(2015)在调查南京方言儿化音变异时亦发现性别差异并不显著的现象,她将原因归结为中国社会越来越高的女性地位。这一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些许启示,中国社会和产出性别标准模型的西方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和男女平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男女平等”更是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人口学研究也指出,中国实行了37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性别教育平等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随着女性相对教育水平的提高,市场中性别收入差距开始缩

小(陆万军,张彬斌 2016)。因此,我们认为德州市区和县城出现的性别差异不显著的现象,原因在于两性具有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这是由我国的社会制度和特殊人口政策决定的。

(二) 乡村性别作用模式的社会动因分析

1. 定性分析

德州乡村出现了性别作用模式与西方标准模型相反的情况。已有研究中这种情况在市区相对较少,而在县城、乡村中相对较多(市区中占 9%,县城中占 24%,乡村中占 22%,总体占 15%)。李荣刚(2011)在连岛村的调查中,将中老年人在(f)变项出现的与标准模型相反的性别作用模式归因于“男人出海,女人拾海”的传统生产模式。虽然德州是内陆城市,不存在渔业,但他的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我们在和当地人深入访谈后,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首先定性地认为,这和城市化进程中德州乡村出现的颇具地方特色的“男人进城务工,女人留守看家”的家庭分工模式有关。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德州乡村这种家庭分工模式。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德州乡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再加上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与日俱增,二者一拍即合。男性由于体力上的优势,更多地选择进城务工,通常是以农民工的身份从事体力劳动,如在工地干活和装修房屋,大多只在农忙和逢年过节时才会回家帮衬;女性则更多地留守村内,负责看护家庭,照顾老人和孩子,即使务工也多局限在乡村内部,比如时不时地帮人打个短工,总体上以家庭为中心。

2. 定量分析

为了进一步定量分析其社会动因,摸清德州乡村该分工模式在人群中的实际分布情况,我们对李家户乡镇人口最多的刘官屯村进行了走访调查。本次调查走访了 56 户家庭,总计 243 人,除去还在上学尚未步入社会的 10 人,总共得到了 233 人的务工情况数据。我们将离开乡村且进城时长至少一年、仍在外务工的人员,视为外出务工者。调查结果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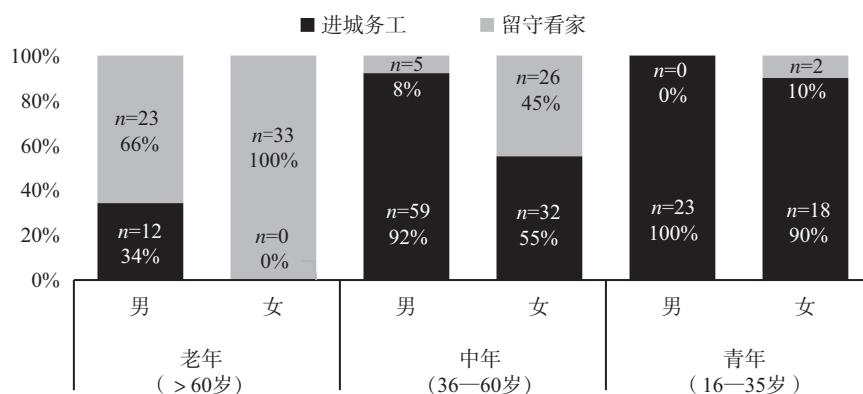


图 4 德州乡村进城务工情况统计

由此可见,德州乡村普遍存在着“男人进城务工,女人留守看家”的家庭分工模式。这种分工模式在中老年群体中十分突出:老年男性仍有三分之一选择进城务工,但老年女性却无

人进城务工；中年人的情况是类似的，男性相比女性更多地选择进城务工，中年男性的务工比例高达92%，女性则只有55%。而青年人由于几乎全部选择进城务工，性别差异并不明显。方差分析也进一步证明，性别和年龄均对务工情况具有显著制约作用[(性别: $F(2,33)=28.285, p=0.000$; 年龄: $F(2,33)=79.147, p=0.000$)]。以上说明，德州乡村进城务工情况在性别和年龄上具有不平衡分布现象。

3. 男外女内分工模式对语言使用的影响

我们将德州乡村进城务工的情况和语言变式选择的情况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发现进城务工的比例和折合变式的比例大致相等（见图5）。较为特殊的是老年女性，她们中并没有人选择进城务工，却依旧有相当多的人选择使用折合变式（37%）。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也显示，除了老年女性外，进城务工的比例和使用折合变式的人的比例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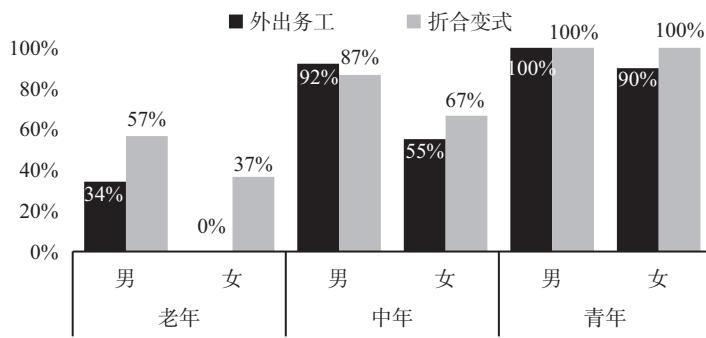


图5 德州乡村外出务工比例与折合变式使用比例的对比

为什么进城务工的人口比例和使用折合变式的人口比例大致相同？人们在外务工的时候为了沟通方便，发音会自觉向普通话“靠拢”（刘正光2001）。詹伯慧（2003）指出由广东省外入粤的民工多数操持普通话，给当地“推普”带来有利因素。龙玫（2005）在调查合江话变异情况时发现，具有外出务工经验者更倾向于标准变式的使用。夏历（2009）将在京民工视为一种超越地域的言语社区，他们在语言使用上相比在家乡，会更多地接近标准语。因此当男性在进城务工群体中的比例显著多于女性时，男性的语言使用相比女性则会更加靠近标准语；而留在乡村的人以女性为主，其乡村人身份的“认同”得以巩固。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相关联，因此女性群体相比男性群体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增加本土变式的使用（高一虹等2008）。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在变式选择上的一增一减，导致了德州乡村中老年人中，女性相比男性会更多地使用本土变式。

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讲，进城务工者相比留守人员更容易接触到普通话，根据 Milroy & Milroy (1993) 在贝市的研究，社会网络会对语言变项的选择产生影响。德州乡村的男性由于普遍选择进城务工，他们的社交网络更加广泛；而女性的社交网络相对来说更加局限于本地，因此具有相对保守、地方化的特征。因此，男性取代女性成为语言革新的发起者，形成了有别于县城和市区的性别作用模式。

4. 乡村老年女性特殊情况的原因

为什么乡村老年女性无人进城务工，她们中却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使用折合变式

呢？本研究进一步对乡村 12 名老年人开展了结构性访谈，其中留守老年女性 8 人、留守老年男性 2 人、务工老年男性 2 人。访谈的内容是首先诱导受访者用方言说出“德州”“腿”“膝盖”“胡萝卜”“肉”五个同时具有本土变式和折合变式的词，结果发现除了“德州”一词有人选择读为折合变式外，其余词所有人均读为本土变式。受访者认为词与词之间的差异和“德州”一词是地名有关，因此相对于其他词语更容易受普通话读音的影响而读为折合变式。接下来在向受访者了解其选择折合变式的原因时发现，老年女性普遍认为受村里或家里其他使用折合变式人群的影响是其选择使用折合变式的主要原因，而她们选择向其他人靠拢，主要是因为认为折合变式代表着受过教育或教育程度高。

（三）小结

综上，在德州市区和县城，性别因素不显著的原因是我国相对西方某种意义上更为平等的两性地位，这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另外，由于城市化过程中城市需要大量劳动力，德州乡村普遍存在进城务工的情况，并且外出务工人群在性别和年龄上呈现不平衡分布，这导致了其性别作用模式同标准模型相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反常现象只存在于乡村的中老年人中而不存在于青年人中，这是因为青年人无论男女几乎全部选择进城务工，因此青年人全部使用更加接近标准语的折合变式[ə]，而完全排斥本土变式[ei]的使用。再者，我们也发现全员留守的老年女性仍然使用一定比例的折合变式，其主要原因是受到周围其他使用折合变式的人的影响。城乡间青年人不再使用本土变式，这是我国城乡融合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在语言使用方面的体现，乡村人口进城务工是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方式。

五、总结

本文运用快速匿名调查法，对德州市(ei)变项在市区、县城、乡村的共时分布情况展开了调查，结果显示，年龄、空间、空间和年龄的交互作用以及空间和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具有显著的制约效应。性别的作用模式在城乡具有显著差异，在乡村，女性相比男性更多地使用本土变式[ei]；而在县城和市区，变式的选择没有性别差异。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两性相对西方具有更为平等的社会地位，这导致了性别因素在德州市区和县城对语言变项的制约作用并不显著；德州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男人进城务工，女人留守看家”家庭分工模式，是造成乡村出现与西方标准性别模型相反情况的原因。另外，德州乡村老年女性尽管无人选择外出务工，却依然使用了一定比例的折合变式，是因为受到周围其他使用折合变式的人的影响，且认为折合变式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这一积极的社会含义。乡村青年人中并没有出现与标准模型相反的性别作用模式，是因为青年人无论男女都几乎选择外出务工。青年人无论城乡都使用更接近标准语的折合变式，体现了当前我国城乡融合建设的积极成果，也反映出外出务工是促进城乡语言融合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在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新阶段，为城乡语言变异的复杂情况及其背后的社会动因研究提供了一个细致的实证案例。

参考文献

- 曹晓燕 2012 《方言和普通话的语音接触研究——以无锡方言为例》,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丁存越 2015 《南京城市方言儿化音变异的实证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 董洪杰 2017 《西安坊上回民亲属称谓语变异及身份认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高一虹,李玉霞,边永卫 2008 《从结构观到建构观:语言与认同研究综观》,《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郭春霞 2008 《山东方言内部比较及分区考察》,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郭 骏 2011 《词汇类型对语音变异的制约——以江苏溧水“街上话”为例》,《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 李庐静 2013 《地方普通话方言变项的使用和扩散——以福建永安普通话“来去”句的调查分析为例》,《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 李 琼 2015 《汉语当代社会称呼语的变异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李荣刚 2011 《城市化对乡村语言变化的影响》,《重庆社会科学》第10期。
- 李 伟,陈章太 2010 《汉语阳泉方言语音变异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 李永斌 2014 《拉萨话对普通话语音的变异影响调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刘 英 2009 《阶层、语体和语言变异——以昆区北方话鼻韵尾变异为例》,《南京社会科学》第6期。
- 刘 英,徐大明 2012 《移民城市语言变异的本土化——以包头昆都仑区鼻韵尾变异为例》,《语言研究》第1期。
- 刘正光 2001 《言语适应理论研究述评》,《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 龙 玮 2005 《合江话鼻韵尾变异调查研究》,《中国社会语言学》第2期。
- 陆万军,张彬斌 2016 《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人口研究》第4期。
- 钱曾怡 2001 《山东方言研究》,济南:齐鲁书社。
- 冉启斌 2017 《变异与分化——较大样本视角下的北京话塞音格局》,《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 单韵鸣 2012 《广州话典型狭义处置句的变异》,《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单韵鸣 2013a 《广州话形容词重叠变调形式的变异》,《语言研究集刊》第2期。
- 单韵鸣 2013b 《广州话动词完成体的变异》,《语言科学》第6期。
- 单韵鸣 2014 《进行中的方言语法变异实证研究——以广州话短暂体的变异为例》,《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 史慧媛 2012 《哈尔滨方言中“哈”的读音变异情况分析》,《学术交流》第4期。
- 史濛辉 2016 《上海市区方言(ø)变项的分布——兼论权威语的迁移现象》,《中国语文》第4期。
- 孙德平 2009 《江汉油田话“潜”字声调变异调查研究》,《语言研究》第1期。
- 孙德平 2013a 《外部因素主导的语音变异——以江汉油田话卷舌音声母变异为例》,《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 孙德平 2013b 《工业化过程中的语言变异与变化——江汉油田调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唐健雄,高彩英 2010 《定州市高油村八十年来父母称谓词的替换》,《燕赵学术》第1期。
- 唐志强 2023 《安徽江淮官话入声时长变异的跨方言研究》,《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
- 王洪君 2006 《文白异读、音韵层次与历史语言学》,《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
- 王佳琳 2017 《哈尔滨话古日母字语音变异研究》,《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王佳琳,侯煜冠 2012 《哈尔滨话合口呼零声母[ʊ]化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学术交流》第10期。
- 王 立 2004 《汉口语[ŋ]声母字读音变异及其原因探析》,《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 王 玲 2009 《言语社区内的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以厦门、南京、阜阳三个“言语社区”为例》,《南京

- 社会科学》第 2 期。
- 王 玲 2011 《句法结构的定量分析——以“有+VP”格式为例》,《汉语学习》第 4 期。
- 王 玲 2012 《城市化进程中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语言适应行为研究——以合肥、南京和北京三地为例》,《语言文字应用》第 1 期。
- 王 玲 2014 《身份认同与儿化使用——以北京儿化为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王 玲,刘艳秋 2014 《城市化中语言适应行为与语音变异关系研究——以(i)变项、(y)变项、(-?尾)变项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 王 玲,徐大明 2009 《合肥科学岛言语社区调查》,《语言科学》第 1 期。
- 王 雪 2020 《哈尔滨“哈”语音调查》,《华中学术》第 4 期。
- 夏 历 2009 《“言语社区”理论的新思考——在京农民工言语共同体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5 期。
- 徐大明 2006 《语言变异与变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徐大明 2008 《语言的变异性与言语社区的一致性——北方话鼻韵尾变异的定量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5 期。
- 詹伯慧 2003 《当前“推普”的一些思考》,《学术研究》第 12 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 1981 《方言调查字表》,北京:商务印书馆。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
- 周晨萌 2005 《20 世纪 80 年代北京口语儿化词的使用情况》,《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5 期。
- 朱学佳 2014 《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汉语使用变异的社会因素分析——以汉语媒介接触中的性别为例》,《语言文字应用》第 3 期。
- Labov, W. 1963. The social motivation of a sound change. *Word* 19(3), 273 – 305.
- Labov, W.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 C. : Centre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Milroy, J. & L. Milroy. 1993. Mechanisms of change in urban dialects: The role of class, social network and gen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1), 57 – 77.
- Xu, D. M. 2015.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inese speech communities. In W. S-Y. Wang, & C. F. Su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